

LES HÉRITIER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 P.布尔迪约 J.-C. 帕斯隆 / 著

继承人

— 大学生与文化

LES HÉRITIERS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继 承 人

——大学生与文化

[法] P. 布尔迪约 著
J. - C. 帕斯隆
邢克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 [法] 布尔迪约, [法] 帕斯隆著; 邢克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7-100-03488-4

I. 继... II. ①布... ②帕... ③邢... III. 高等教育—研究—法国—现代 IV. G64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7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ÍCHÉNGRÉN: DÀXUÉSHĒNG YU WÉNHUÀ

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

[法] P. 布尔迪约 著

J. - C. 帕斯隆

邢克超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488-4/G·456

2002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1.00元

*Pierre Bourdieu et
Jean - Claude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5

©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本书根据法国午夜出版社 1985 年版本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 版 说 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目 录

告读者	1
第一章 中选者的选择	3
第二章 严肃游戏与游戏严肃	35
第三章 学徒还是小巫?	69
结 论	87
附录 I 法国的大学生	101
附录 II 几项调查结果	121

告 读 者

本文的主要依据,是我们在欧洲社会学中心进行的一系列调查^①——其完整结果业已发表、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大学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以及一些专题研究和初步调查。后者是由我们自己,或者在我们指导下,由巴黎和里尔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分组或独自完成的。它们包括:大学生中的相互了解(里尔小组)、在考试面前的不安(B. Vernier)、一体化的尝试(里尔小组)、大学生的闲暇活动(G. Le Bourgeois)、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大学生(巴黎小组)、巴黎大学古代戏剧小组及其观众(巴黎小组)。

我们很少提及对全体大学生或其他学院大学生的各种调查(大学生与政治、里尔大学图书馆的使用者、医科大学生、女大学生),文科大学生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据着特殊地位。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大学生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点后面可以看到^②。另外,我们并非不知道,在现在为数众多的对文化与教育的研究中孤立地分析文化特权,就把可能提

① P. 布尔迪约 (Pierre Bourdieu) 和 J. - C. 帕斯隆 (Jean - Claude Passeron)《大学生和他们的学业》,高等实践学校出版物《欧洲社会学中心手册》,Mouton et C°出版社,1964年,巴黎。

② 见本书 5 页。

2 告读者

出来的无数问题压缩成了一个。但是,为了抓住一般提问方法几乎总是掩盖的根本问题,难道不应该冒这个风险吗?

第一章

中选者的选择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曾经极力效仿有幻觉者的举止。尚未‘探求幻觉’的年轻人，一般都要被带着去聆听别人有过幻觉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多，它们详细描述了被视为‘真实景象’的经历和特殊的环境……。这一环境使超自然的会见产生效果，赋予这些人打猎、从事战争等权力。但奥马哈人却不同，故事不交代有幻觉者看到的具体内容。经过更深入的考察，人们清楚地看到，幻觉并不是随便什么人只要探求便能得到的一种神秘经历，而是一种精心保护的方法，以使某些家族继续属于巫师社会。原则上讲，自由探求的幻觉可以使人进入社会。但是，幻觉是所有年轻人都能探求并得到的、并无具体规定的神秘经历这一说法，已经被严格保守的秘密所推翻。这些秘密涉及构成真正幻觉的所有方面。想进入强者社会的年轻人，应当躲到僻静之处，不进饮食，回来后向长者叙述他们的幻觉。但是，如果出身于非杰出家庭，他们的幻觉不能被认证。”

玛格丽特·米德*：
《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 Margaret Mead, (1901 ~ ?), 美国人类学家。—译者

发现不同社会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并为之惋惜,能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在教育面前的不平等?反复讲高等学校里仅有6%的工人子弟,是不是为了得出大学生是资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论?或者说,人们以反对事实来代替事实并往往取得成功,是不是要自圆其说,宣扬能反对自身特权的集团就不是特权集团?

无疑,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面前最初的不平等,在高等教育阶段首先表现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不均。还应当注意到,出身于就业人口中人数最少的社会属类的人,在大学生中占的比例最大。所以,不同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占的比例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对父亲职业与儿子进大学机会关系的粗略统计显示,农业工人的儿子上大学者不到1%,70%的工业家儿子上大学,自由职业者儿子上大学的比例超过80%。这一统计清楚地表明,教育系统客观地进行着淘汰,阶级地位越低受害越深。但是,人们对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某些较为隐蔽的形式,如中下层阶级子女集中于某些专业并且学习进度迟缓,察觉得不够。

人们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中看到了一种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对社会出身不同学生的宽严程度极不平等。对地位最低的阶级来说,简直就是淘汰¹。高级职员儿子进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

6 第一章 中选者的选择

是工人儿子的 40 倍, 是中级职员儿子的 2 倍。这些数字把对高等教育的利用划分为 4 个层次: 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属类, 今天只有象征性的机会送子女上大学(不足 5%); 某些中间属类(一般雇员、手工业者、小商人)的机会近年来有所增加, 在 10-15% 之间; 中级职员的机会比前者约高出一倍(接近 30%); 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再翻一番, 接近 60%。尽管有关的人并未有意识地评价这些客观学习机会方面的差异, 但它们是如此之大, 以各种方式反映在日常感觉之中, 并且决定着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即它是“不可能的”、“可能的”还是“正常的”前途。而正是这些看法决定了对学业的选择。高级职员的儿子和工人的儿子, 不可能对将来的学业有共同的体验。前者进大学的机会超过二分之一, 在他周围, 甚至在他家里, 接受高等教育是很平常的事。后者进大学的机会不足五十分之一, 只有通过中介人或中介环境才能了解大学的学业和学生。

我们知道, 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 家庭外的联系也在扩展, 但仅限于相同的社会层次。所以, 对社会地位最低的人来说, 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

在根据社会出身对学习机会进行的这一不平等分配中, 男女大致上是平等的。不过, 女孩略显不利, 尤其是在下层阶级里。就整体而言, 女孩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略高于 8%, 男孩为 10%。男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别在下层社会中更为明显。在中高级职员家庭中, 这一差别趋于减弱或消失。

学习方面的不利还表现在, 就有理由考虑的学业而言, 各

类学生受到的对选择的限制也不同。因此,同一社会出身的男女青年上大学机会的接近,不应掩盖如下事实:进入大学后,他们不学同一专业的可能性很大。首先,不管出身如何,女生选文科的可能性最大,男生选理科的可能性最大。我们承认,这是受传统的男女劳动分工模式(和“天资”)的影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更多的女生被判定进入培养教师的文、理学院:农业工人的女儿上大学后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为92.2%,同一出身的男生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为80.9%;工人的儿子和女儿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80%和85.3%;一般雇员的儿子和女儿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63.6%和74.4%;中级职员的儿子和女儿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68.5%和84.1%;高级职员的儿子和女儿进这两个学院的机会分别为59.3%和74.3%。

女学生的社会出身越低,选择越可能受限制。中高级职员女儿的情况可以反映出这样一种逻辑:上大学是以在选择专业方面受限制为代价的,社会出身不同,这一限制的严格程度也不同。中级职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最接近,但他们的女儿被放逐到文学院的机会(61.9%)也明显高于其他所有社会职业属类(农业工人除外)。与此相反,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女生上大学的机会与男生明显相等,进文学院的机会也少些(48.6%)。

一般说来,在选择专业方面受到的限制,下层社会大于上层社会,女生大于男生。下层社会女生的处境最为不利。²

最终看来,如果说性别方面的不利主要表现在把女生放

8 第一章 中选者的选择

逐到文学院，那么就应当说社会出身方面的不利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既表现为对一些出身低下的儿童的纯粹淘汰，又表现为对免遭淘汰的人在选择专业方面的限制。这样，这些学生就得以被迫选择文学院或理学院为代价进入高等教育。后者对他们来说，只开这两个门，而不是全部的五个门。高级职员子女学习法律、医学或药学的机会为33.5%，中级职员子女为23.9%，工人子女为17.3%，农业工人子女为15.3%。

但是，出身于某一社会职业属类家庭的学生在文学院注册的机会，只能含混地反映对出身于下层阶级者的放逐。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与上述情况相互影响：文学院及其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或语言等专业，也可能成为出身于就学机会最多阶级的大学生的避难所。这些人因社会原因被“强迫”接受高等教育，但缺乏积极的动机，只好选择这些至少表面上给他们以社会声望的专业。因此，出身于某一社会职业属类的学生在文学院中所占比例的含义不很清楚。文学院对一些人来说是强制选择的结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避难所。

如果说进入各专业的不同可能性确实导致了放逐现象的产生，人们就可以预料，教育机构的等级化可以导致由社会地位最高者独揽最高学府。由此，高等师范学校和综合技术学校*里出身于上层社会的学生比例最高，出身于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学生分别占两校学生总数的57%和51%，出身

* 同属法国地位最高的几所“大学校”，后者亦译作“理工学校”。——译者

于中级职员者分别占 26% 和 15%。³

教育面前不平等的最后一种表现,是出身于下层的学生入学晚,进步慢。这在各种水平的课程中都可以见到:阶级地位越低,标准年龄(即该年级最常见的年龄)学生的比例越小;越是高年龄组中,出身低下的学生的比例越大。⁴

表 I 不同社会出身的人的学习机会
(1961 - 1962)

家长的社会 - 职业属类	学生 性别	入学 机会%	条件概率(%)				
			法学	理学	文学	医学	药学
农业工人	男	0.8	15.5	44.0	36.9	3.6	0
	女	0.6	7.8	26.6	65.6	0	0
	平均	0.7	12.5	34.7	50.0	2.8	0
	男	4.0	18.8	44.6	27.2	7.4	2.0
农民 *	女	3.1	12.9	27.5	51.8	2.9	4.9
	平均	3.6	16.2	37.0	38.1	5.6	3.1
	男	2.7	18.6	48.0	25.3	7.4	0.7
服务人员	女	1.9	10.5	31.1	52.6	4.7	1.1
	平均	2.4	15.3	41.3	37.0	5.5	0.9
	男	1.6	14.4	52.5	27.5	5.0	0.6
工人	女	1.2	10.4	29.3	56.0	2.6	1.7
	平均	1.4	12.3	42.8	39.9	3.6	1.4
	男	10.9	24.6	46.0	17.6	10.1	1.7
一般雇员	女	8.1	16.0	30.4	44.0	6.1	3.5
	平均	9.5	21.1	39.4	28.6	8.6	2.3
	男	17.3	20.5	40.3	24.9	11.0	3.3
工商业主 *	女	15.4	11.7	21.8	55.7	4.8	6.0
	平均	16.4	16.4	31.8	39.1	8.1	4.6

* 这两个纯粹是统计上的分类,他们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农民包括所有农业经营者,而不管其经营规模;除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之外,工商业主还包括在统计中未能单独计算的工业家。在另外的统计中,后者是高等教育的最大用户之一(见附录 I, 表 1.9)。因此,审慎阅读上表的办法,是主要关注最同质的属类。

10 第一章 中选者的选择

	男	29.1	21.0	38.3	30.2	8.5	2.0
中级职员	女	29.9	9.1	22.2	61.9	3.4	3.4
	平均	29.6	15.2	30.5	45.6	6.0	2.7
自由职业者 与高级职员	男	58.8	21.8	40.0	19.3	14.7	4.2
	女	57.9	11.6	25.7	48.6	6.5	7.6
	平均	58.5	16.9	33.3	33.2	10.8	5.8

如果说被迫选择文理学院确实是中下阶层在教育方面的不利的表现(尽管他们甚至把这种命运当作志向来体验),如果说理科学业确实与社会出身关联较少,⁵如果人们同意社会出身的影响在文科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观点,那么把文学院视作研究文化因素对教育不平等作用的最好场所,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呈同步曲线状的有关统计,只能揭露结果、淘汰、放逐和耽搁。与常理相悖的观点实际上要说的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在文化方面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所受其地位的影响,在被这一不利地位所放逐的地方最大。

经济方面的障碍,不足以解释“教育死亡率”会因社会阶级不同而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在15—20年中,学校对出身不同的人采取的行动是要使他们一致,其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只需求助于更强的适应性和更有利于规避淘汰的家庭环境。⁶但是,即使如此,即使没有其他任何标志,也不知道学校不间断地淘汰出身于下层的儿童众多的、往往是迂回的途径,人们在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可以发现与社会出身明显有关的态度和能力方面的差异,而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出身低下的儿童有许多文化障碍要克服。

在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社会出身无疑对大学生界影响最大,超过了性别和年龄,尤其是超过了这种或那种明显表现出来的因素,如信奉何种宗教。

不同社会出身者的学习机会

